

· 学术通信 ·

编者按：本辑《法律文化论丛》继续刊载霍存福教授写给刘杨编辑关于《权力场》一书出版事宜的通信，读者在字里行间可以体悟到霍存福教授在《权力场》一书上所倾注的心血；也会被霍教授对学术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。

霍存福就《权力场》致编辑刘杨同志

刘杨同志：

你好！

10日的来信收到了。从信中得知你还没有接到我的信，回头找了吴先生，才知道吴先生在等着王占通兄的信件一块寄发。本来，通知王兄的事，吴先生托我转达，但我一直记不住。半月前才告诉了他。俟写完后，让他另行寄去。王兄已调到新成立的“长春出版社”，他是我的师兄，将来作为同行，你们少不了联系的。

我八月份写的信，这次一并寄去。你的热心，对我是很大的鼓励。借此机会谈一下我的想法。

《权力场》的选题，我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明朗化的，因而，我是满意的。你在出版界，对作者选题情况是熟悉的。说实在的，选择一个前无古人的而又切实可做文章的题目，并不容易。尤其是被长期忽略的问题，能够被发掘出来，对改变人们的方方面面的传统看法确有石破天惊的震撼作用。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，我发现：史学界的许多结论，如果从“权力行使理论”的角度来看，都有重新评判的必要。至少我现在发现“皇权逐渐加强与相权逐渐削弱”说同“皇权逐渐削弱与相权逐渐加强说”都应修正。我的分析之后结论为：皇权无所谓加强与削弱，本身无大小，否则就不是专制政体；但相权却是有消长的。我现在正稿这个专题，拟于这学期的中期，完成一个四五万字的长文发表。以后将“各个击破”，按书稿的顺序逐个搞下去。

由于出版无着，这部书稿的写作已一拖再拖。书的结构在第一次写提纲的时候就形成了。你手头有的，是第二次补写的提纲。对于这样一个选题，我不愿意白瞎了，总想把它搞得精道一些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现有资料和观点整理成文章发表的缘故，换成其他人，大概早已遍地开花了。此外，另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一直想出书，而不想让零碎的文章把这么一个系统而宏大的选题搞乱了。专著会更有助于提出一整套理论。我想让《权力场》成为政治学者案头必备书，并能得到政治制度史、社会学、历史学者的较高评价及征引，就算对自己负责了，也算对这样一个选题的负责态度吧。

因此，如果你能争取明年底或后年上半年出版，我将全力以赴工作，就不再打算发

文章了。一部书的内容,若1/3以文章形式发出去,是否有价值出版,我是怀疑的。如果不太容易的话,我只好一边写书,一边发文章了。这是我提笔时的一点想法,不是硬性约定要你答应出版问题。出版界的情况,我也了解一些,大略一个“钱”字捆住了许多想干实事的编辑的手脚。

再者,关于书稿的政治性问题,我也想附带说几句。政治上,我不保守,也不偏激。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,我是一个门外汉。由于搞中国史,我无暇去读西方学术名著。对我来说,这可能是终生的缺憾。现在读的个别书目,也只是为能搞好《权力场》增加一些灵感而已。我曾开玩笑对同志说:如果说到什么“化”的话,我的“封建化”恐怕要比“自由化”要多得多!因此,文章及书稿,我从不曾搞过影射——那不是学问,对现实促进不了什么,反而会搞糟自己。所以,平心静气的研究,实实在在的分析,是我的史学研究的特色。不过,我不想脱离社会。一般人包括我周围的朋友总觉得我可惜,希望拉我加入他们的现实研究的行列中。但我以为,历史学的“无用”,只是由于过去研究内容、方法及角度太陈旧给人们造成的错觉,如果是新角度、新方法,历史学也会有用。《权力场》的部分内容,在给校外及校内学生讲授时,都说有用。因为它的理论色彩,给了同学们一把认识现实的权力行使方式及特点的钥匙。他们用我的理论去套现实,这多少促进了他们的思考。历史干预现实的方式,恐怕很多,大约这应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。

无论怎样,《权力场》会一直写下去的。对于一部基本资料已具备的书稿(我的提纲是在材料基础上形成的),充实与得出结论、不断完善,将是永远干不完的活。目前,除了教学任务及我先生的项目之外,其他时间,我都倾注于《权力场》。如果一直不能出版,搞到尽头可能是一部五十万字的大“砖头”。

最后,我赞赏你對自己满意书稿的穷追不舍的劲头,这是有志青年人应有的劲头。作为编辑,抓住好书稿,确实是成功的关键。希望你顺此路走下去。此外,我也希望你不仅是一个编辑,同时也是一个学问家。北京中华书局及一些大刊物的编辑都有很有分量的文章,仅历史学就可以找到很多例子。你可集中一个方向,搞一些专门研究。它与编辑并不冲突。

文安!

霍存福

1989年9月19日晚

[责任编辑:夏婷婷]